

## 晚期现代的意识形式与战争经验

### ——对《达洛维夫人》的现象学与政治哲学分析

董明来\*

**内容提要:** 作为西方现代文学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是对西方现代性经验本身的一种描绘。基于此,本文讨论《达洛维夫人》中三个互相纠缠的要素:对客观时间意识与人格观念的解构,与叙述视角割裂的统一的叙述风格,以及被叙述的,属于晚期现代性的民族战争(亦即总体战)的经验。本文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分析与客观时间和人格观念相对的内时间意识以及情绪流动,从叙述学的角度论证小说中原初的意识结构与其叙述风格之间的关联,并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讨论了小说中的总体战经验对小说结构的作用。本文通过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达洛维夫人》的叙述方式,是西方晚期现代性视域下人格与时间经验新形态的结果。

**关键词:** 《达洛维夫人》; 现象学; 时间意识; 政治哲学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classical works of the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Mrs. Dalloway* portrays the experiences of Western modernity itsel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ree phenomena in the work; the deconstruction of both the "objective time" and the fixed personality, the uniform style of narration that is opposed to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on and the style of the narrator,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s of wars between nations as a symptom of the late modernity. Using Edmund Husserl's method of phenomenolog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ner time consciousness and the flow of affects which are opposed to objective time and personality. It addre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rigin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style of nar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Final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experiences of war in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Mrs. Dalloway*; phenomenology; consciousness of time; political philosophy

---

\* [作者简介]: 董明来, 哲学博士,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现象学、符号学与美学方向的研究。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 20 世纪的英语文学中,主体的时间意识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本文试图阐明,这种原初的时间意识绽露出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性所造成的主体性危机。对于许多现代英语文学作品而言,让这种主体性危机更加凸显的,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现代战争——它们并非早期现代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意义上的战争。在霍布斯看来,一旦国家建立,那么战争就只存在于国家之间,亦即,它总是外在于国家内部之文明秩序的自然状态;相反,在伍尔夫和艾略特等英语作家的作品中,主体危机的真正背景,是民族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强迫所有人直面其威力的总体战。自然,总体战的巨大身躯并不应当被单纯地理解成英国现代文学之内容的“物质前提”: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领域内,这一思路也已经被扬弃(张碧 39—41)。正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指出的那样,20 世纪英国作家们的时代“亦在文学与艺术语言的新的变异形式与结构上留下了印记,而‘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正是泛泛地被用以描述这种语言的变异”(Jameson 2007: 152)。也就是说,根据詹姆逊的观念,世界的危机并不作为作品的内容被表达,而是通过作品崭新的形式,标明了意识在这一危机的压力下产生的改变。詹姆逊所讨论的是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危机;而本文所强调的是标示了文明社会之“内部”与“外部”区分的,那种界限的崩溃。被总体战的经验所打开的视域不但改变了形式本身,而且改变了对于形式的意识。在此视域下,作为意识形态的“固定人格”概念受到了挑战。

## 一、原初经验与人格:《达洛维夫人》与时间哲学

如下一个事实或许并非偶然:在现代英语文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迎来其重大革命之前不到 20 年,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就在 19、20 世纪之交开始思考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在他 1905 年的时间现象学讲稿的开端,胡塞尔指出,主体对时间的原初经验,并非时钟式的客观时间:后者将时间理解成一个空间中的几何线条;这个线条可以被绝对清晰地划分为不同的线段;而在这些线段中,经验也就作为事件,被空间性地并置。与之相反,胡塞尔认为,他称为“内时间意识”的原初时间意识,是由一个始终流逝着的“此刻场域”。在这个有“广延”的此刻中,包含了被称为“后摄”的“刚刚过去的经验”,以及“即将到来”的“前摄”(Husserl 1966a: 14)。胡塞尔指出,这种作为经验流动的时间意识,比时钟式的,或

者编年式的时间更为源始：后者是对我们经验的抽象化与知性化，而前者是我们获取外部经验的必要形式。胡塞尔的这一系列洞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名作《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81)的重要视角。

马丁·哈格伦德(Martin Hägglund)认为，在伍尔夫的作品中，有一种对于个体的经验之时刻(moment)的“提纯”(crystallization)，但是“这种提纯的美学和情绪性的力量，并非来自一种对于永恒的暗示，而是来自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投入：这种生活对于变形(transformation)与失却极为敏感”——这种“变形与失却”，恰恰就是“时间的命运”(Hägglund 58)。也就是说，伍尔夫的小说形式的质地，恰恰在于它标明了时间经验的流逝本质：它从根本上就不是可资分割与测量的、现成与固定的对象，而是让流逝的经验成为可能的，意识的本质结构。或者干脆说，伍尔夫的文学写作和胡塞尔的哲学思考所揭示的，是同一种关于时间意识的事实。

自然，现代英语小说的结构与现代性的时间意识的类似，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更关键的是，时间意识是主体意识的一部分。而正如詹姆逊在他2013年的著作中敏锐地察觉到的那样，在现代性视域下，小说叙述中对编年式时间的解构，与对情绪(affect)的分析是平行的(Jameson 2013: 27—28)。在此，作为一种体验方式，情绪是感情(emotion)的对立面：感情是一种可以“被名称之光所分类”，一个“被把握为现象的系统”。谭光辉也意识到，“情感”不但有着不同的部分，而且这些不同的要素构成了一个有着组合轴和聚合轴的结构(谭光辉 140—144)。在此，系统性和符号化是一个现象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更关键的是，有着清晰结构的，可以被符号所指涉的感情是“有其对象的”，亦即，它是意向性的(Jameson 2013: 28)。与之相反，情绪不但逃脱了意识的命名之光，而且是一种没有对象的“身体感觉”(Jameson 2013: 32)。也就是说，可被命名的感情是意向性的，而情绪则不是。

这种“身体感觉和语言之间的对立”，可以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得以澄清：根据胡塞尔的理念，“情感”(Gefühle)有两个含义：它既可以是“情感性的行为”(Gefühlsakt)，也可以指某些“非意向性的要素”，而后者是“感知性的情感”(sinnlichen Gefühle)(Husserl 1984: 406)。更关键的是，后者是被前者使用的质料，而前者则包含了概念性的“意义”(Sinn)：比如说，一个喜爱的情感行为“投射”了“好的”这样一个价值性的意义；这个意义投射的行为是意向性的，它构建了一个有特殊价值的对象，并且从

属于某个理性的伦理体系(Husserl 1950a: 198—199)。也就是说,从现象学的角度讲,詹姆逊所意识到的感情与情绪的不同,实际上是意识行为与意识所利用的,“无意识”的感知质料之间的区别。情绪之所以无法命名,是因为它们只是可被命名的“本质”所利用的材料。

更进一步的,詹姆逊意识到,在现代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时间意识,似乎与对于传统的,稳定且不变的“人格”概念的不信任处于一种双生的结构之中。他指出,“事实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主体之死’概念,亦即,对人格认同与中心化意识这些概念的问题化,为对情绪的理论兴趣做出了准备”(Jameson 2013: 79)。在这里,对于人格的简短现象学描述似乎也成为有必要的。在现象学的视域内,人格是自我(ego)的一个特殊形式,后者首先是现象学还原所留下的纯粹意识的统一性,是一个单纯的形式—功能:它仅仅表明,诸意向行为从属于一个同一的时间之流之中,而且这些行为所利用的感知质料,亦全部属于同一个主体。显然,无论是情绪还是感情,都被这样一个作为形式功能的自我所统一。

而人格,则是形式自我的“生活历史”的结果:每一个属于这个自我的时间经验,都会落入后摄之中,并且进一步沉入一个“遥远的过去”(Husserl 1966b: 174; 178)。这些过去的经验并未消失,而是成为主体内部的“沉淀物”:它们会在特定的,与过去之场景类似的新场景中被“唤醒”。在此,被“唤醒”并非指被作为意象对象而被积极地“回忆”,而是消极地“引导”这个主体以某种特定的“风格”来利用某些具体的感知质料(Husserl 1963: 101; 1950b: 220—223)。这些决定了主体在一个具体情境下的行为倾向性,是这个主体的“人格特质”;而人格,就是这些特质的集合。如此这般的人格,在面对具体的快感或者痛感的情绪材料时,会倾向于以一种特定的感情行为来利用它们:比如说,痛感的感知材料,对于一个在传统上来说是“懦弱的”人格而言,是一个“厌恶”行为的质料;而一个“勇敢”的人格则会倾向于用另一种感情行为来“利用”同样的质料。简单来说,人格和感情的关系可以如此描述:意向性的感情行为,受作为人格之内容的“人格特质”所影响,而从作为意识行为的感情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此人格的诸内容。哈格伦德意识到,克拉丽莎·达洛维始终处于回忆之中,因为她必须时刻“回忆(collect)她自身”(Hägglund 64)。对自身认同的回忆是一种搜集,因为人格归根结底不过是诸人格要素的集合,而这些要素,实际上并不一定处于一个“和谐”的关系之中。同时,在《达洛维夫人》中,情绪的彰显和人格的被结构都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在

这个文本中被叙述的,都只是模糊的恐惧、欢欣、尴尬等“情感”的流动;叙述者在不同的主体视角之间跳跃,但是这种跳跃,却并未造成流动之叙述的中断。也就是说,“情感”的流动对于不同的人物来说是一致的;我们无法通过对这些“情感”的描述,来逆推“影响”它们的人格内容。从而,在这里被描述的是质料的流动(被胡塞尔称为“质素”[Hyle]),而非感情。不妨比较这个段落:“人们一定会注意到的;人们一定会看到的。‘人们,’看着那瞪着骑车的人群,她想道。[……]她看着人群。帮帮我,帮帮我!她想要朝着屠夫的儿子和女人们呼喊。帮帮我!”(Woolf 24)以及下面一段:

一切都很怪异。第一次到伦敦,到她叔叔在利德贺街的店里就职,然后现在在早上穿过摄政公园。这对夫妇让她着实大吃一惊;那位年轻的妇女看上去是外国人,而男人看起来很怪异。[……]而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显得如此怪异……麦兹·约翰逊确实地觉得,她需要呼喊。恐怖啊!恐怖!她想要呼喊。(Woolf 26)

第一段文本所叙述的,是雷齐娅·沃伦·史密斯的意识,而后一段的“声音”则来自麦兹·约翰逊。可以看到,“可怕的”(awful)、“帮帮我”、“怪异的”(queer)以及“恐怖”(horror)这些语词,在这两段文本中可以互相替换;亦即,在不同的意识中,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情绪的功能:充当意向行为的质料。比如说,在雷齐娅的意识中,赛普提摩斯的自杀言论是一个意向对象,而“怪异的”“可怕的”感觉,都可能是这个言论所引发的“感官反应”。相应的,麦兹看到的“怪异的”和“恐怖”的东西,也同样可以是“可怕的”,并且让她发出“帮帮我”的呼喊。

实际上,在笔者所列的两段文本之间,叙述的视角在同一个场景中经历了多次转变。更重要的是,虽然拥有这些视角的角色是各自不同的主体,而且拥有极为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她们内心独白的“风格”并不能让人对她们的身份与“个性”作出区分:我们并不能通过文体分析来说明,雷齐娅是否勇敢、麦兹是否悲观,或者邓普斯特夫人是否和善。也就是说,一般对于文体作为人格之个性的表达这一意见,在《达洛维夫人》的叙述之中并不适用。在上面的文本中,真正能够把史密斯夫人和麦兹的人格区分开来的,是意识的具体对象:雷齐娅把赛普提摩斯构建为“丈夫”,并且把她和丈夫之间有过的经验构建为一些具体的事件——无论是作为

他人的丈夫,还是作为事件的过去经验,都是被意识积极地构建的对象。正是这些作为行为之“产物”的对象,而非行为之质料的情绪,让我们能够区分不同的人物。这些事件只从外部描述了这些人物在社会之网中所处的位置,告诉我们麦兹不是伦敦人,她在伦敦有一个亲戚,而她本人则是一个刚刚离开家庭的 19 岁少女;但是,这一切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物在面对同样的情绪质料时,会有怎样的倾向性,亦即不能告诉我们,这位遭受了不幸的少妇和这位刚刚离家的少女,究竟是勇敢还是懦弱。工人赛普提摩斯·沃伦·史密斯一旦“成功”,作为社会关系之产物的他的“人格”,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同时,对于这些具体的人物,其个人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仍然是属于客观时间的。比如麦兹将自己的时间经验通过日历而区分为 19 个“年份”。而客观事件的一个更为常见的数字形态,则是时钟上的刻度:彼得·华尔士之为彼得·华尔士的人格通过下午三点这个客观时间中的钟点来把握自己(Woolf 63)。正如胡塞尔在其《危机》中表明的那样,“伽利略式的自然科学……还是一种理论—逻辑的基地,一种就原则而言不可被感知、不可被经验的东西的基地;而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性,只能在其被实际经验到的各个方面被区分”(Husserl 1954: 130)。虽然个人生活中的内容,甚至是对太阳位置的视见和对时针作为一种视觉表象的接受,都确实地是可以经验到的,但是那种被标准地、客观地等分为 24 小时的时间,却只是一种不能被直接感知,而只能由逻辑—数学式的知性所把握的东西。现代人的经验是被这种逻辑结构所遮蔽的经验:日常体验的流动性被纳入了 24 小时制的规整之中。

在彼得·华尔士人格中,这种时间模式仍然顽固地起作用。但是即使是他的意识,也被整合入了小说整一的叙述形式之中。正是这一具体的艺术形式,让人格概念和客体时间的解构成为了可能。

## 二、《达洛维夫人》中的时间意识与叙述形式的关系

我们已然表明,对于现象学和英国现代文学,时间意识的本真形式是重要的动力。但当我们讨论文学时,“形式”却往往可以表明两样东西:文本本身的形式,以及作为文本对象意识本身的形式。同一个意识,无论

其形式是否本真,都可能被各色不同的文本形式所意指:它可以被胡塞尔式的哲学—学院语言所意指,也可以是任何文学形式的对象。从而,文本的形式也就并非意识形式的单纯模仿,否则同一种意识形式,就必然要求同一种“表达”的风格。同时,现象学描述本身的语言功能也超越了现象学家本身意识:首先,现象学家本人的人格在还原中被悬置;更重要的是,在悬置中被保留的纯粹意识,是一切意识的抽象本质——它也就是他人意识的本质形式(Husserl 1963: 108)。通过这种“干涩”的风格被描述的意识形式,既可以属于“无趣的现代哲人”,也可以属于“多愁善感的诗人”。

从而,原初的经验、感知与思考以及“自我言语”可以在另一个主体的语言之中被意指;而这种意指关系不但来自另一个角度,而且完全可以来自另一种声音:“‘那你怎么样?’彼得·华尔士说道,确实地颤抖着;抓住她的两只手;亲吻她的两只手。她变老了;他想,坐下。我不应该告诉她任何关于那个的事,他想,因为她变老了。她正在看着我,他想;一种突然的尴尬袭向了他,虽然他亲吻了她的双手”(Woolf 40)。

“他想”这个言语单元表明,这个意识,这个意识的内容,这个意识的流动与情感,都被另一个主体,亦即叙述者所“报道”。整个段落的过去时把这个事实暴露地更加明确了:每个原初经验都生活于其此刻场之中,它只能以现在(前瞻—后顾)这个方式生活于其体验流之中,而这个文本却将这个意识连同其流动本身把握为某种已然过去了的东西。此处,过去并不是后顾的内容,而是再构建的对象:亦即,一种积极的,对已然沉入了遥远过去的无区别之中的内容的意识,这种意识并不像后顾那样只是消极地作为此刻的一部分而在场,而确实地必须是意识的注意力之光的焦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一切意识都只能成为其本身的意向对象:他人的意识就起本质来说,不能为我所知,而只能作为其本身的反思式意向的内容。但是此处,这个华尔士的他者却可以将华尔士本人的意识的流动作为一种回忆建构出来。从而,叙述者也就获得了某种超越性的身份;而问题在于,这个超越者的语言风格:

她现在离他很近了,可以看到他盯着天空,喃喃着,拍着他的手。然而霍尔莫斯大夫说他没什么事。那么出了什么事呢——那么为什么他离开了,为什么,当她坐在他身边时,他开始朝她皱眉头,挪开,指着她的手,拿着她的手,惊恐地看着它?

是不是因为她拿掉了她的婚戒?“我的手变得这么瘦了,”她说。“我把它放进我钱包里了,”她告诉他。

他放开了她的手。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他想道;伴随着痛苦,伴随着放松。绳索被斩断了;他站了起来;他是自由的了……(Woolf 67)

第三段实际上是从赛普提摩斯的视角进行的描述,但是这种视角的转变极为难以察觉:这并非仅仅因为读者的粗心,而是因为此处的叙述风格保持着一致。正如上一节已经指明的那样,从人格的角度来说,丈夫显然不同于妻子;而如果文体形式致力于描述传统人格的不同,那么它就自然应该采取不同的叙述风格来描述二者:这种要求在《达洛维夫人》中,基本被无视了。在这里,同一的叙述方式比喻式地破坏了这种表达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达洛维夫人》中,发生了叙述者与叙述视角的断裂:小说在多个主体的视角中自由滑动,但是拥有这些视角的意识,却被一个拥有整一语言风格的叙述者所叙述。

在此,作为“能指”的语言的形式,与作为“所指”意识的之形式,是被双重分节的。这一双重分节的结构是对这样一种传统叙述观念的解构:不同的人格所操持的语言,是不同的,比如在《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 1847)中,仆人约瑟夫的“粗鄙”人格,通过他的方言被特别地标出。而在《达洛维夫人》中,叙述的重点落在了对于所有人格而言是同质化的意识流动之上;相应的,伍尔夫为这一同质化的流动内容,准备了同质的叙述风格。伍尔夫对于人格抑或风格相对应的传统叙述的反讽运用,还体现在下一个事实上:彼得·华尔士是维特的20世纪版本,二人之间的对应不但体现在《达洛维夫人》中的人物关系之中,而且特别在华尔士的刀这个意象上涌现:华尔士毕竟没有像维特一样自杀,但是一再被叙述者的注意力所聚焦的刀仍然是那种潜在行动的符号。而华尔士的布尔乔亚做派又恰恰成为维特的反讽。同样的,在工人阶级少女麦兹·约翰逊的意识中响起的“恐怖”(horror)的声响,也似乎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回应了《麦克白》(*Macbeth*)中属于贵族麦克德夫的呼喊——后者关于国王被弑这一“严肃的事实”,而麦兹不过是看到了一对“怪异的夫妻”的争吵。

反讽从来不是单纯的否定或者拒绝,而是一种对于被反讽之物的辩证式回归。也就是说,它是对文学形式简单的自我同一的合题式意识:这种意识唯有通过否定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与被意识之物之间

的距离。对于经典文学的传统来说,不朽的形式无意识地,自在且简单地与其内容所同一;而现代作家们的写作行为,则必须建基于形式与内容,甚至是形式—内容这一模式本身的崩溃。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形式—内容之间和谐状态的崩溃,为什么必须与客观时间意识的崩溃相伴相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后者作为一种崩溃的原因与结果就必须被理解。或者说,为了解答形式本身的问题,我们仍然多少需要知道,这样的形式是在怎样的历史压力下涌现出来的?

### 三、战争、利维坦与个体：伍尔夫小说中 解构人格的时代力量

伍尔夫的赛普提摩斯或许是某一类闯入者们最早的形象：他们从总体战的战场上返回,带来了针对个体的威胁。从经典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在共同体建立之后,个体之间的战争状态就结束了：战争变成了利维坦之间的战争,利维坦从处于外部的战争中保护处于自身内部的文明社会。正如霍布斯注意到的那样,利维坦所保护的社会是一个商业的社会,因为在自然状态之中“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及社会等都将不存在”(Hobbes 76)。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达洛维夫人》之中赛普提摩斯之外的其他角色而言,从战场上幸存也就意味着回到商业的世界;医生威廉姆爵士试图用“家庭感情、荣誉,以及一个光明的职业生涯”这个图景来说服赛普提摩斯(Woolf 101—102):治疗的目的正是恢复某人工作的能力,并让其回归中产阶级秩序之中。上层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分在此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赛普提摩斯的职位完全可以是在一家手套店里,而克拉丽莎们将会在此流连。根据霍布斯的框架,所有阶级的经济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利维坦的保护:在自然状态之中存在的,只可能是基于自然—生理强力的掠夺,而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当然,从意识的层面上来说,“上层阶级”们或许仍然未曾注意到世界的改变:对于克拉丽莎来说,“外面”仍然只意味着印度,而不是德国或者法国;也就是说,“外部”仍然只是内在于被利维坦所保护的和平的,“航海和外洋进口商品”的商业领域,而不是属于“民族敌人”的陌生土地——后者与“敌对的利维坦”之间

的区别恰恰在于,这种敌对性重新对每个个体提出了要求。

仍然回到赛普提摩斯: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闯入者,他的意识破坏了人格的概念——他“不再是赛普提摩斯了”,也就是说,不再是雷齐娅聪明而又勤奋的丈夫了。对于他人来说,这个非人格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的内在毫无意义。但是,这陌生的,甚至是悖谬的石块却仍然是一个主体,也就是说,有一个内在的意识之流;正是在这个意识之流之中,在它的生活历史之中,它失去了它的人格性。根据小说的叙述者,“赛普提摩斯是第一批志愿者之一。他去了法国,为了保卫英格兰,拥有全部的莎士比亚戏剧,伊莎贝尔—玻尔小姐穿着绿裙子走过一个广场的,英格兰”(Woolf 86)——在此,战争所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作为整体的英国,亦即,民族。对于霍布斯来说,当士兵们失去了其指挥系统和来自母国的给养时,作为个体的他们也就有了十足的理由投降(Hobbes 491)——公民对于利维坦的责任,在利维坦对公民的保护失效时,也就同时停止。而在民族战争之中,任何英国人对英国的责任都是无限的。当然,在赛普提摩斯的个人体验之中,民族主义与其他要素互相交织:我们完全可以辩论说,英格兰对于他而言并非一个虚构的共同体,而是一个由莎士比亚所支撑起来的文化认同,更不要说作为少年爱恋对象的伊莎贝尔小姐了。但是同时,来自民族国家的对于个体的要求却是真切的,而这种对于一个经验之主体的无限要求,在我看来正是全部个体梦魇的原因,而这种原因,就其本质而言,正是莎士比亚的反面——它是真切的,对人文主义的否定。

在战场上,热爱莎士比亚的赛普提摩斯最终冷漠地看着自己的挚友死于空战(Woolf 86)。詹姆逊认为,“对空战极其技术的研究凸显了卷入其中之个体的去人格化,以及他们之被同质化入一个更大的机械之中……”(Jameson 2013: 256)。赛普提摩斯之意识的去人格化与整个军队的去人格化是同一个进程。他对于死亡和友谊的迟钝情感暴露了如下一个事实:对于被卷入民族主义战争中的个体经验而言,人文/文化模式的身份认同再度让位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之战争”的“人类天性”。所谓的“人类天性”,根据霍布斯的观点,是一种纯然动物性—身体性的东西:它们对快感或者痛感产生反应。现象学地说,这种对于痛感和快感的感官反应,就是詹姆逊所描述的情绪。在《达洛维夫人》中,把指向莎士比亚与友人的,人个性的感情解构为作为“纯然人类天性”之情绪的,是战争。在战争中凸显出来情绪,似乎并未覆盖情绪光谱的全域:经由一战,赛普

提摩斯失去了某些情绪,而另一些情绪则占据了他。

前面提到过,在《达洛维夫人》中,确定的人格与可分割的时钟时间息息相关,后者遮蔽了时间意识的原初结构。根据胡塞尔的观点,这种遮掩和规整是从笛卡尔到康德的整个西方哲学的结果。詹姆逊亦指出,乔伊斯对《奥德赛》的反讽式运用标明了,“神话之意识形态的破产同时也是一般性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破产”(Jameson 2007: 138)。从一个泛马克思主义或者泛批判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确乎可以说,唯有通过规训与惩罚所建立起来的固定人格,才能确实地为资本主义秩序(作为现代性的最终产物)提供稳定而可靠的劳动力。但是,在《达洛维夫人》中,解构赛普提摩斯的人格,并且改变了这个个体的情绪能力的,却是他的战争经验。这一战争经验是布尔乔亚式人格的反题,与之相应的,是解构了客观时间的伍尔夫的小说形式。然而,与试图解构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格概念本身的现代文学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一开始恰恰预设了对人格概念接受,因为这一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民族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一个超越个体的人格实体。

民族主义并非通过反人格而将自己与其否定的正题区分开来;民族概念与布尔乔亚意识之间的对立,在他们对于人文主义的不同理解之中展开。现代民族主义的祭酒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明确地提出,总体性的“敌友区分”不但超越了任何道德、美学与经济的标准,而且“表明了最高强度的联合与分裂,合作或者不合作”(Schmitt 1976: 26—27)。民族是最高等级的结合:它是人民的结合,但人民却并不是诸多个体的共同体,而是将这些个体作为自己的部分来对待的整体。这个整体对其部分的掌控超越了任何美学的标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英格兰民族要求每一个英国人服从,无论他们是否热爱莎士比亚。热爱莎士比亚的赛普提摩斯注定要在一战中失去自己,因为民族本身是对莎士比亚所代表的美学价值的否定。“血腥的人类天性”控制了赛普提摩斯:民族战争是这样—一个情况,在其中“政治整体要求牺牲生命”——也就是说,个体被要求为了民族而回到自然状态之中;而利维坦之间的战争也就以一种霍布斯本人或许未曾梦见的方式穷尽了这个隐喻的全部潜能:战争不再是两群人的代理机构就生存空间而进行的争斗,而是两个拥有其人格的巨人之间的荣耀之战。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人格之所以在《达洛维夫人》中遭受了危机,是因为作为其形式基础的个体性本身遭受到了诘问。

但是在这种对个体性的诘问中,只能属于个体的“人类本性”毕竟保留了下来。这种人类本性是感受身体疼痛和恐惧的情绪能力。在总体战中,这种被遗留下来的情绪能力所面对的情绪有着前所未有的强度:个体不再是被利维坦的骨骼与肌肉包裹的脏器,而是成为巨人的皮肤。而重要的是,施加于巨人皮肤的疼痛,由巨人的力量所造成;而这种力量与其结果,完全超越了个体的感受能力——作为虚构的人格利维坦并没有实际的经验,但仍然拥有造就经验的全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利维坦的出现与欧洲现代科技的发展同步,虽然民族利维坦的理想模型,是古老的。这种模型的灵感,可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Plato 152—153, 462a—d; Aristotle 4—5, 1253a19—39),即使把二者理解为“希腊民族主义者”是一种全然的误读。民族利维坦的模型,要求国家将其全部国民作为整体之部分来控制;这一理想,唯有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才是完全实际的:当然,此处的“现代技术”不只是作为外部力量的警察与军队,更重要的是,作为“内部”力量的全套现代传播技术,甚至是生命科学。苏格拉底的理想之国仍然会因为对优生学的无知而最终崩溃(Plato 240—241, 546a),而这种无知在现代视域下,至少一度被认为已经得到了解决。将国家整体作为政治的最终目的这个思想,或许已然存在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但是这个思想的实现,这个苏格拉底口中的奇迹,却确乎只有实证科学才能将之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也确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反题:殖民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形式,在民族战争面前崩溃了。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事实上,“外部”已经不再是克拉丽莎想象中的,异域的与“不文明”的东方,而是法国与德国:与英国同样的“文明国家”;但是在文明国家之间发生的敌对,却远超过英国与印度、英国与中国之间的敌对。同时,施密特意识到,一旦布尔乔亚式的生活获得了统治地位,“主权之决断性的,人格性的要素就从而失落了”(Schmitt 2005: 48)。国家内部的商议或者阶级斗争取消了主权作为创造者的位格:例外情况不再拥有凌驾于个体日常生活之上的尊严,而仅仅成为布尔乔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浪漫想象。施密特式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了其对资产者的反动: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人格化了的个人体验,那么现代主义的文学就是试图从人格意识形态那里拯救个人经验,而施密特的目的,则在于重建作为绝对人格的主权对于个人经验的权威与统治。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施密特才如此赞赏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毕竟在后者的文本中,国家总体总是必须“打心底震撼”自由的个体,并且“侵犯他们的独立权利,虽然个体们,沉溺于其自身的生活,试图从整体中挣脱……”(Hegel 272—273)。在黑格尔这里,国家是个体自由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否如詹姆斯(Jameson 2013: 258)说的那样,通过对资本逻辑的破坏体现出来,在此并不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试图从客观的政治—经济视域来处理民族战争。而作为文学作品的《达洛维夫人》则直接处理“主体的震撼”在个体意识中的呈现。总体战否定了个体本身;在这种否定中,个体基于客观事件的人格被解构,从而使情绪性的内时间意识绽露了出来:总体战经验既是这种新的意识之形式得以呈现的历史动力,又是这种意识之流的重要内容。

## 结 语

民族战争对个体的去人格化的目的,在于重申民族作为真正人格—主体的地位。在一战时,民族主体的这个要求对于克拉丽莎们而言或许仍然是含混的:她甚至仍然在抱怨战争让手套店关了门。对于“上层阶级”而言,一战或许仍然外在于他们的日常体验:这种外在性,在二战中彻底被打破。一开始它仅仅属于像赛普提摩斯这样的工人的梦魇,现在成为了普遍的梦魇:它不再属于某个阶层或者阶级,而是属于整个文明。在《达洛维夫人》中,关于战争的经验仍然是在乐观的伦敦六月中,通过赛普提摩斯而间接地展开的(Hägglund 63)。但是在艾略特(T. S. Eliot)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二战则直接成为伦敦的现实:被轰炸的伦敦是所有对于个体而言可理解的价值之否定:它不但否定了希望,而且否定了希望的反题。这个施密特式的最高等级的斗争是两个黑格尔式的超实体的斗争。

事实上,即使对于赛普提摩斯而言,一度使他失望的文学仍然习惯性地存在于人格崩溃之后的意识之中:“他不能感受。他可以思考;他可以读,比如说,但丁……”(Woolf 88)哈格伦德认为,《达洛维夫人》的主题是创伤与幸存,而幸存的概念总与永恒的概念结伴(Hägglund 65)。但同时,哈格伦德也正确地指明,赛普提摩斯之死“并不是一个精神的升华,而是一个悲剧的跌落”(Hägglund 74)。赛普提摩斯跳下窗户,并非因为他想抛弃其个体性而进入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民族精神”,而只是因为威廉姆爵士的闯入;布尔乔亚人格并不能真正让他的个体经验幸存。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ristotle. *Politics*. Reeve, C.D.C,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8.
- Hägglund, Martin. *Dying for Time: Proust, Woolf, Nabokov*. Boston: Harvard UP, 2012.
- 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Miller, A. V, trans. Oxford: Oxford UP, 1977.
-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
- Husserl, Edmund.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r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0a.
- .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0b.
- .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4.
- .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3.
- .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a.
- . *Analysen zur passive Synthesi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b.
- .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Teil*.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84.
- Jameson, Fredric. *The Modernist Papers*. Memphis: Verso, 2007.
- . *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Memphis: Verso, 2013.
- Plato. *Republic*. Reeve, C.D.C,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4.
- Schmitt, Carl.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George Schwab, tran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76.
- . *Political Theology*. George Schwab, tran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5.
- Woolf, Virginia. *Mrs. Dalloway*.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vich, 1981.
- 谭光辉：“情感间性的符号学研究”，《符号与传媒》，2018 年第 17 期，第 138—150 页。
- 张碧：“卡冈美学理论中的符号学方法”，《符号与传媒》，2018 年第 16 期，第 38—46 页。